

# 法國傳教士殷弘緒來華活動述評

劉芳\*

法國傳教士殷弘緒於清初來到中國，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多年，跨越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傳教於北京、江西等地。他對歐洲最大的貢獻不僅在於其對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起了一定的作用，尤重要者在於他將中國製造瓷器和人工種痘的技術傳到了歐洲，對歐洲的工藝、醫學等多方面起了重要的引介作用，充當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殷弘緒，西名為 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字繼宗，法蘭西人，1698年來到中國後傳教於江西、北京等地。他把中國的中醫保健、瓷器製造的工藝等引介給歐洲，對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

## 傳教於中國

在殷弘緒來中國之前，法國對中國越來越關注，不斷派遣傳教士東來，殷弘緒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來到中國的。1698年2月21日他來到廈門後接受利聖學神父的任命去饒州傳教。<sup>(1)</sup>他赴饒州傳教始於1698年，當時法國傳教士利聖學與郭中傳、孟正氣同時被派到江西開闢教所，傳教於撫州、饒州、九江一帶。在饒州和九江兩城，他們遭到官吏阻撓長達一年半，因此這幾個地方的傳教活動一開始就不見好轉。此後，利聖學將這三座城市分別託付給傅聖澤、殷弘緒與孟正氣三位神父照料。殷弘緒在饒州首先為一位貧窮的泥匠工人洗禮；不久泥匠死去，殷弘緒為他舉行喪禮，“華人頗異之，時為新年，來堂詢問者不下萬人”。雖然如此，當年入教信徒僅二人而已。然而到1712年，經他受洗者已有八十人之多了。<sup>(2)</sup>

殷弘緒在江西的傳教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傳教方式。首先，他很懂得與當地官員保持良好關係。雖然他坦言：“與這些新官打交道我毫無經驗”<sup>(3)</sup>，然而為了傳教的自由和新信徒們的安寧，他們又必須得到這些官員的保護。因此他決定盡快拜訪他們，送一些歐洲禮品來贏得其友情。

1712年饒州地區出現了嚴重的旱災，當時的道臺求助於殷弘緒，殷弘緒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向他宣講天主教教義，得到了這位官員的好感，甚至向全城貼出了保護基督教徒、禁止偶像崇拜者向他們強制徵收用於偶像崇拜等活動錢財的告示。<sup>(4)</sup>殷弘緒甚至想使當時的皇帝康熙皈依天主教，來保護和擴大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當時正值康熙廢立太子時期，他以一個神父敏銳的眼光看到了這是一個使皇帝皈依天主教的絕好機會，因為他看到皇帝經受了這樣的打擊後很有可能會在宗教上需求幫助。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深知逆境比順境更宜於讓人反躬自省，因此，為使這位偉大君主皈依，我勉勵所有的傳教士舉行彌撒聖祭並更新祈禱內容。”<sup>(5)</sup>他自己則不遺餘力地與皇帝保持良好的個人關係。康熙皇帝由於身體原因常飲葡萄酒，他就利用江西巡撫朗廷極向皇上進獻了西洋葡萄酒六十六瓶。<sup>(6)</sup>在中國禮儀

\* 劉芳，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明清史及港澳史。

之爭中，殷弘緒堅定地站在中國這方，1708年4月26日，他獲得正式領票。<sup>(7)</sup>他來到北京之後，經歷了雍正禁教時期，傳教形勢越來越嚴峻，殷弘緒一面以醫生的身份登門拜訪那些出門不方便的女基督徒們，一面在各個地方為她們分別主持聖事，便於她們分散地參加。<sup>(8)</sup>他最後二十年秘密傳教之行跡多類此，直至最後的四年身染廢疾，祇能坐臥，然傳佈教義卻至死不輟。<sup>(9)</sup>他為了在中國傳播福音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

日常傳教之外，殷弘緒還寫了大量信件回歐洲介紹中國知識，一方面當然是為了引起歐洲人的興趣以擴大影響，爭取更多人支持中國傳教事業，另一方面也是受法國科學院的委託在華進行科學和學術活動，向西方介紹中國的科技成果。

### 引介製瓷技術

中國瓷器以其千姿百態的造型和沉積着數千年燦爛中華文化的瓷繪藝術和清純亮麗的色調而得到西人的青睞。瓷器是羅柯柯時代的代表，它的光彩、色調和纖美，正像一首詩所贊揚的：“中華土產有佳瓷，尤物稱人從所思。藝苑能闢新世界，傾城何處開如斯。”<sup>(10)</sup>

自16世紀而後，歐洲掀起了一股收藏中國瓷器的風尚——

去找那種瓷器吧，  
它那美麗在吸引我，在引誘我。  
它來自一個新的世界，  
我們不可能看到更美的東西了。  
它是多麼迷人，多麼精美！  
它是中國的產品。<sup>(11)</sup>

不管是皇室貴族抑或是平民均以擁有華瓷而自豪。1713-1740年間，普魯士皇帝選皇后就通過外交談判，曾以六百名魁偉健壯的御林軍衛兵和鄰近的君主換取一批中國瓷器，以為其婚禮增

色，成為世界外交史上一件奇聞。<sup>(12)</sup>而法國路易十五的情婦蓬巴杜夫人也是一位瓷器愛好者，她經常光顧巴黎專營中國物品的商店，在1772年12月27日她一次就從該店購進了價值五千利佛爾的五個形狀各異的青花瓷瓶。<sup>(13)</sup>

為了滿足西方人的審美需要，中國瓷器就以西方人的口味而製造。現今大量收藏於西方博物館中的華瓷，使我們清楚地看見，有些瓷器上繪有西式樓臺、聖母耶穌像等，均是當時為了迎合西人而在中國特別製造的。然而這種情況並不能滿足歐洲人的奢求，因為中國工匠畢竟很難做出完全符合西方人審美所求的作品，另一方面運輸困難也使得流入歐洲市場的瓷器非常昂貴，就算是貴族有時也難以支付高昂的費用，更何況一般民眾。當時歐洲商人必須用金銀幣償付進口的東方瓷器，致使歐洲金銀庫存日漸枯竭。據說法王路易十四曾下令將法國所有金銀器熔化，以償付他宮廷內的進口瓷器。因而生產本地瓷器則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問題。<sup>(14)</sup>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瞭解瓷器製作工藝，得以在歐洲本土生產瓷器，就成為歐洲人的當務之急。歐洲人做製華瓷的歷史由來已久，16世紀意大利各地已開始做製中國軟質瓷器。1575-1587年間佛羅倫斯的陶工在托斯卡納公爵的贊助支持下生產出被稱為梅第契(Medici)瓷器的歐洲第一批原始瓷器，但其胎質、釉質與中國瓷器相差甚遠，且產量極為有限。

看來旅行家們的記載對於歐洲做製技術的突破沒有多大意義。元朝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就曾在其遊記中粗略地記敘了瓷器的製作：德化人(中國人)“從地下挖取一種泥土，將它壘成一個大堆，任憑風吹、雨打、日曬，從不翻動，歷時三四十年。泥土經過這種處理，質地變得更加純化精煉，適合製作上述的各種器皿。然後抹上認為顏色合宜的釉，再將瓷器放入窯內或爐裡燒製而成”。<sup>(15)</sup>利瑪竇也提到了江西的瓷器：“最細的瓷器是用江西所產黏土製成，人們把它們用船不僅運到中國各地，而且還運到歐洲

最遙遠的角落，在那裡它們受到那些欣賞宴席上的風雅有甚於誇耀豪華的人們所珍愛。”<sup>(16)</sup>這種情況直到身兼數職的法國傳教士來到中土後才得到改觀。耶穌會士錢德明就曾給貝爾坦寄去了他的文章〈中國制瓷史〉。<sup>(17)</sup>而對於關鍵的瓷器製作工藝，即瓷器的配料，給瓷器帶來光澤的釉及瓷器的質地，裝飾瓷器的色彩及上色這樣的技術資料，一直到18世紀，才為來華傳教的殷弘緒所瞭解。<sup>(18)</sup>

由於在中國瓷器生產中心江西景德鎮地區傳教的經歷，殷弘緒可以正確和全面瞭解瓷器的製作，特別是他還提到：“除了親眼目睹之外，我還從基督徒那裡聽說了許多特殊情況，他們中間不少人是從事瓷器生產的，另一些人則做瓷器生意。此外，我還通過閱讀論述這一問題的中國典籍核實了他們給我的答覆的真實性，通過這一方法，我認為對這門技藝有了全方位的相當準確的瞭解。”<sup>(19)</sup>他提到這些瓷器知識都是“走訪瓷工作坊時經親自瞭解或向從事瓷器生產的基督徒請教後隨手記在紙上的”<sup>(20)</sup>。

他先介紹了製瓷的兩種原料：坯胎子土和高嶺土，特別是指出了高嶺土在製作瓷器中的絕對重要性。精細的瓷器正因為高嶺土才這般堅實，它猶如瓷器的肋骨。他還提及曾經有英國或荷蘭人曾經想帶坯胎子土回國製作瓷器，但是由於沒有高嶺土而計劃失敗。他把高嶺土在瓷器中間的作用比成是骨架在軀體中的作用。坯胎子土和高嶺土都需要淨化去除渣滓後才能使用。由於製作瓷器的品種不同，瓷土的比例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製作細瓷時需要各自相半的瓷土；製作普通瓷器則四成高嶺土對六成坯胎子土。<sup>(21)</sup>在對好坯土後，人們再把坯土放入一個大坑一直不停地揉、踩，直到坯土變硬。在這個過程中，殷弘緒強調了不能讓坯土中有任何空隙或者異物，否則就會影響將來瓷器的品質。他還提到了另外一種製作瓷器的新配料——滑石，也叫白堊。用滑石製作的瓷器相當罕見，因此遠比其它瓷器昂貴。它質

地細膩，若與普通瓷器相比，就如同上等的羔羊皮與一般紙張相比。<sup>(22)</sup>

殷弘緒提到了製作釉的方法。例如關於青花瓷的藍色釉料的製作，他介紹道：首先把這種天藍色的石頭“埋入窯內半法尺厚的砂礫之中，燒烤二十四小時後把它與其它顏料一起放在一個很大的瓷研鉢(而不是放在大理石上)裡研成極細的粉末，研鉢底部及搗槌頂端都不上漆”<sup>(23)</sup>。紅顏料則是糟礬經過火燒化在坩堝內而製成的。對於瓷器的白釉殷弘緒也提到了：“這種白顏料是透明的石粉製成的，與天藍色顏料一樣，它是在窯裡燒烤成的。在半兩這種石粉中放入一兩鉛白粉末。其它顏料中同樣也要摻入這些東西。例如配製綠顏色，就用一兩鉛白、半兩透明石粉、再加入三兩稱為銅花片的東西。配製好的綠顏料是紫色顏料的母體：前者加入一定量的白色顏料便成了後者。綠色顏料的比例越高，紫色就越深。取七德拉克馬的白顏料加上三德拉克馬的糟礬紅顏料便成了黃色。”<sup>(24)</sup>

值得一提的是殷弘緒還提到了冰裂紋瓷器的上釉。他說冰裂紋瓷器是因為祇上了用白色石子製作的釉，這種釉可使瓷器呈現灰白色。瓷器的通體都有大理石花紋，周身佈滿了各種走向的紋理，遠遠看去就像是瓷器破碎了但是碎片仍留在瓷器上。<sup>(25)</sup>

瓷器的製作是一個流水作業的過程。殷弘緒舉了一個杯子的製作過程來說明瓷器的製作：首先，一個工人從轉輪上面拿下杯坯，按照要求來修改它的直徑和高度；第二名瓷工把杯坯和杯座粘在一起，開始的時候是分開來做的；第三名瓷工把它放在模子裡壓印上圖案；第四名工人在把杯子刮光，尤其是杯子的邊緣，必須刮得很薄，看起來像是透明的一樣。一件最後燒好了的瓷器是經過了七十個瓷工的勞動。大型的瓷器是分開來做的，先把它們分解成幾個小的器皿，然後在最後把它們一個個粘合起來，再用專門的工具雕琢、拋光使之完善。

殷弘緒的這兩封信傳到歐洲之後，被刊登在歐洲的《專家雜誌》上。1717年，殷弘緒又將

高嶺土寄往歐洲，在歐洲掀起了一股尋找高嶺土、做製中國瓷器的熱潮。在這種風氣的推動之下，1755年終於在愛陵崗附近發現了類似景德鎮高嶺土的瓷土層，並且開始製作真正的瓷器。18世紀，法國的做瓷技術有了顯著的進步，已將中國瓷的設計、裝飾、彩繪與西方軟瓷的燒造工藝有機地結合在一起。<sup>(26)</sup>其它歐洲國家也紛紛接受中國的製瓷技術，對當時整個歐洲的瓷器工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國著名歷史學家S.A.M阿謝德說：“18世紀耶穌會士帶回更多的中國技術資料並被採用，歐洲才生產出真正的瓷器。”<sup>(27)</sup>

他雖然經過了長期的實地考察，對中國的製瓷工藝作了細緻而又翔實的紀錄，但其紀錄仍然有很多缺陷。原因有二：第一，他認識的多半是下層工人，特別是他提到在新信徒中沒有人從事釉料的配製這項工作。<sup>(28)</sup>第二，就算他認識了某些會製作釉料的人，又有多少工人會把全部知識毫無保留地告訴這個外國人呢？出於行業壟斷的保密需要，對於某種技術一般的持有者是相對保密不願意讓人知道的，特別是關鍵工藝，殷弘緒說：“我無法知道這些(上釉彩)配料的分量，知道這一秘密的人們注意不予洩露。”<sup>(29)</sup>例如在關鍵的釉色上，他的記載就太不足了。他祇提到了幾種常見的釉色，而中國瓷器的釉色遠遠不止這幾樣，例如做古的釉色，就有鐵骨“大觀”釉、銅骨無紋“汝”釉、油綠釉、東青釉、月白無紋釉等三四十種。<sup>(30)</sup>而且很多釉料的煉製材料也不是殷弘緒記載的那樣簡單。煉製釉料的材料有鉛粉、青礬、松香、古銅、白炭等等，且釉料配製也非常複雜，配料的比例是非常精細的，遠非殷弘緒記載的那麼簡單。

### 對中國植物和醫藥的介紹

歷史悠久使得中國產生了一大批燦爛的文化和科技成果，並且形成了一個掌握着傳統文化和

科技知識的文人階層，他們成為中國社會的“文化代表”和“科技貴族”。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法國耶穌會士為適應中國歷史文化背景的“中國化”傳教策略就是“科技傳教”。<sup>(31)</sup>同時，他們來華的目的也不僅僅在於傳教，法國傳教士由於受過學校良好的科學訓練，遠非其它天主教修會的教士可比，加之在遠東的傳教範圍廣大，就成為法國科學院來中國作科學考察首先考慮的對象。<sup>(32)</sup>

殷弘緒來華進行科學考察的興趣主要集中在植物醫藥上。他曾對杜赫德神父說過：“我承認，凡對教化生靈有用的工作我都樂意為之。我常為自己在歐洲時沒有上藥劑學的課而感到遺憾。看到我手抄的一大本藥方，您會驚訝的。”<sup>(33)</sup>

他提到曾經利用閒暇時間，通過閱讀中國植物志而做過某些考察。他想通過對中國藥草志的瞭解，更好地瞭解歐洲藥草的療效，進而為歐洲的醫療事業服務。他說：“這位中國植物學家在有關該國的無數植物問題上，該能為我提供多少的看法啊！其條件是我能有時間去研究它，並能為他們提供一個歐洲名稱。因此，我祇注重於我所瞭解的和在歐洲人所熟知的那些植物。”<sup>(34)</sup>

殷弘緒對中國醫學的興趣，尤其表現在其對中國人工種痘的介紹上。

中國關於天花的最早傳說是在清代醫學家朱純嘏在《痘疹定論》中記載的一則傳奇故事：宋真宗(998-1022)或仁宗(1023-1063)時期，四川峨眉山有一醫者能種痘，被人譽為神醫，後來被聘到開封府，為宰相王旦之子王素種痘獲得成功。1729年的《哲學通訊》中伏爾泰第一次明確地談到中國的牛痘：“我聽說一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就有這種習慣；這是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最講禮貌的一個民族的偉大先例和榜樣。中國人的種痘的方法的確是不大相同的；他們並不割破皮膚；他們從鼻孔把痘苗吸進去，就好像聞鼻煙一樣；這種方式比較好受，但是結果一樣。這一點也可以證實：倘若我們在法國曾經實行種痘，或許會挽救千千萬萬人的生命。”<sup>(35)</sup>

目前有據可證天花種痘的明確記載見於清代醫家俞茂鯤的《痘科金鏡賦集解》：“種痘法起於明隆慶年間(1567-1572)，寧國府太平縣，姓氏失考，得之異人丹徒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種花者，寧國人居多。”<sup>(36)</sup>

上述記載說明中國至少在16世紀已經較為成熟地掌握了人工種痘的技術，17世紀已普遍推廣。此推廣則得益於康熙皇帝。滿清入關前，由於東北天寒地凍，地廣人稀，因此天花並非大規模流行。然入關之後，幾次天花肆虐，令滿清統治者聞之色變。據史書記載，清初多爾袞攝政時期，對民間出花者採取了野蠻殘酷的“驅疹”措施，“凡遇民間出痘者，即令驅逐城外四十里”。這種政策在多爾袞攝政王死後略有收斂，但是仍有規定，家裡若有出痘之人，要立報兵馬司，官家“即引繩度鄰右八十步，繩以內官吏俱不許入署，都民始安。”<sup>(37)</sup>

公元1682年，康熙皇帝下令各地種痘。《庭訓格言》中有記載：“訓曰：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得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癒。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尚以為怪，朕堅意為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傳教士中有殷弘緒、錢德明、韓國英、巴多明等涉及中國的天花人工接種技術。

法國國家圖書館現收藏有一本精美的畫冊，在塔夫網上畫有六十二個患天花的小孩頭像，顯示天花種痘和每種發病部位，據于阿爾德意見，此畫為在華傳教士的作品。<sup>(38)</sup>

殷弘緒仔細介紹了中國人種痘方面的知識，應該說他對中國人的種痘術也有一個逐漸認識的過程。他於1715年的信中提及中國的種痘術，但對此卻充滿懷疑，他說：“我不大相信這種辦法，如果有的話，我寧願採用一撮蛙蛇粉末。”<sup>(39)</sup>

但當他來到了北京，閱讀了《種痘概法》等醫書後就改變了看法，但收集人工種痘的知識，並非易事。中國醫家以此術為秘傳用以求生之

道，怎可輕易示人？張琰就曾歎言：“醫書充棟，惟種痘之術不傳，蓋術家欲專其利，故秘其術以自私也。”

<sup>(40)</sup>因此想全面獲得比較真實的資訊確實是對殷弘緒的一大挑戰。為此他使用了多種手段：“(人工種痘)這還是秘而不宣的一種方法，我毫無遺漏地收集這方面的知識，這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必須送禮以外，我還得答應不得洩漏祇是為了歐洲好才告訴我的東西，還必須到不止一處去收集秘方加以對照、比較，看看它們各自適於何種情況，因為往往有各種操作辦法，從中也可以學到不少。我下文將要介紹的三種處方是宮中的御醫告訴我的。說實話，不是最有名的御醫，而是宮中級別較低的御醫告訴我的。”<sup>(41)</sup>

人工種痘是從收集痘痂開始的，先找到一個一歲至七歲以內的痘疹已發出又沒有任何惡性症狀的孩子，等到痘疹結痂掉落時，就把乾了的痘痂收集起來放在一個瓷瓶裡，用蠟密封起來。新近取得的痘痂需要處理，人們先把一把蔥根切碎，加一點甘草，放入一隻盛滿熱水的瓷杯裡，用薄紗布蓋上，把痘痂放在紗布上，讓熱氣薰蒸一段時間，然後拿下來晾乾，這樣它就有較合適的效力了。在使用方面，殷弘緒介紹道，接種乾痘痂時，把需要的一定份量的痘痂放在蠶繭裡，然後把它塞進孩子的鼻孔裡，不久孩子就會發燒，十二天以後就會乾結掉落。他還提到接種之後的護理，指出可以用赤豆、黑豆、綠豆、甘草研成粉末煮成糊狀，作為預防藥給孩子吃，這些都是有利於他排除毒素的。<sup>(42)</sup>他認為中國給孩子接種疫苗比英國式接種方法直接切開皮膚接種，要更溫和，危險性更小些。

應該承認的是，殷弘緒在向歐洲傳播中醫理論時，存在着交流的障礙。中醫理論取法於中國哲學中道法自然和陰陽五行學說，根本上不同於西方的醫學理論。事實上，殷弘緒也承認自己在醫學上所學不多。他駁斥了西方人對中醫的懷疑，雖然中國人缺乏解剖知識，有些處方顯得沒有科學道理，但是他高度評價了中國醫術，認為

其在實踐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並認為它有助於歐洲醫術的發展。他說，並不像歐洲有的人認為的那樣，中國的醫生無知或者冒險。自己對他們的醫學論述不能作出判斷，那些論述中的語言莫測高深，中國人也不能全懂。但是自己有機會翻閱了不多的醫書，相信如果能把這些書籍譯成我們的語言，歐洲的醫生們對他們有關各種疾病的診斷、症狀描述、藥物及其品性的介紹一定會很滿意。<sup>(43)</sup>

正如法國歷史學家羅莎所分析的那樣：“中醫的價值是不容置疑的，但由於翻譯、理解和向西方傳播的困難，西方人面對一種他們很難理解其新穎性和豐富性的外來因素之思想狀態，西方人對這種醫學表現方式的誤解等等一切都使得他們失去了勇氣。”<sup>(44)</sup>

### 結語

殷弘緒在中國四十多年，他一方面勤勤懇懇地傳播福音，傳教於若干城市，克服了資金不足的困難，特別是到了雍正後期傳教工作受阻的時候，他從不放棄任何一個傳播福音的機會，想法設法盡量多施洗一些教徒，甚至不顧自己身體的孱弱，堅持傳教工作，可以說為中國的福音事業貢獻了自己的生命。同時，他也不辜負作為18世紀中西方交流的使者。他憑藉自己良好的教育、豐富的學識和對客觀事物正確的認知態度，長期居住於中國，甚至於在中國宮廷中生活。他熟悉中國文化，得到了任何單純的旅行者和商人所不可能想象得到的中國知識。

應該說，殷弘緒瞭解到的這些中國知識，並不是敷衍地道聽途說。在他的信件中我們看到，為了弄清楚瓷器的製作工藝和植物醫藥的真實功能，他除了閱讀相關的中文書籍外，還親自請教那些懂那些知識的中國人，親臨製作現場觀察，並做詳細的筆錄。我們在信件中，完全可以讀到他那科學的嚴謹而謙遜的性格，諸如以下的表達方式：“我僅介紹我在一部中文書讀到的內容，

自己並不能保證作者就此問題所記載的一切均為事實。”“我去請教那些精於此種工藝的中國人。”“我希望這些研究能夠有點用，這是我花了一點力氣做了研究以後的唯一想法。”他的態度是認真的，所介紹的內容絕大部分也是客觀公正的，對於向歐洲人宣傳的中國形象，也大部分是正面的。

殷弘緒介紹中國的主要信件被杜赫德所採用，編入了《中華帝國通志》，而這本書，無疑是當時歐洲最流行也是最權威的中國讀物，甚至影響了伏爾泰、孟德斯鳩、黑格爾等人。他的信件不僅僅涉及傳教方面，簡直可以說包羅萬象，涉及中國17世紀到18世紀的方方面面，在中國與歐洲的文化交流上，他寫下了光輝的一筆。

總之，殷弘緒神父帶着傳教的使命來到了中國，但他對中國和整個世界的貢獻已遠遠超出了他原來的目的。

### 【註】

- (1)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504。
- (2)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549。
- (3)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二卷，頁137。
- (4) M. L. Aimé-Martin,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concernant l'Asie, l'Afrique et l'Amérique, avec quelques relations nouvelles des missions, et des notes géographiques et historiques*, tome troisième, Paris, Société du Panthéon Littéraire, 1843, p. 193.
- (5) M. L. Aimé-Martin,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concernant l'Asie, l'Afrique et l'Amérique, avec quelques relations nouvelles des missions, et des notes géographiques et historiques*, tome troisième, Paris, Société du Panthéon Littéraire, 1843, pp. 162-163.
- (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漢文朱批奏摺彙編》，第475件〈江西巡撫郎廷極奏摺〉，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年。
- (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冊，頁75。

- (8)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三卷,頁206。
- (9)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551。
- (10) 張西平:《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的哲學交流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年,頁271。
- (11) (英)赫德遜著,王遵仲等譯:《歐洲與中國》,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59。
- (12) 張國剛:《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38。
- (13) 馮棠、孟華:《法國文化史》,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1998年,頁445。
- (14) 簡·迪維斯著,熊寥譯:《歐洲瓷器史》,杭州: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1年,頁26。
- (15) (意)馬可·波羅,陳開俊譯:《馬可·波羅遊記》,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年,頁193。
- (16) (意)利瑪竇、金尼閣,何高濟譯:《利瑪竇中國笱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5。
- (17) 許明龍:《歐洲18世紀“中國熱”》,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69。
- (18) 參見周在群〈景德鎮製瓷秘密與法國牧師〉,載《科技文萃》,1995年第11期,頁230-232;洪秀明,〈中國“高嶺”揚名與法國殷弘緒的功勳〉,載《上海工藝美術》,2004年第3期,頁70-71。
- (19)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二卷,頁87。
- (20)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二卷,頁247。
- (21)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二卷,頁95。
- (22) (23) M. L. Aimé-Martin,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concernant l'Asie, l'Afrique et l'Amérique, avec quelques relations nouvelles des missions, et des notes géographiques et historiques*, tome troisième, Paris, Société du Panthéon Littéraire, 1843, pp. 309-310; p. 315.
- (24)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二卷,頁98。
- (25) M. L. Aimé-Martin,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concernant l'Asie, l'Afrique et l'Amérique, avec quelques relations nouvelles des missions, et des notes géographiques et historiques*, tome troisième, Paris, Société du Panthéon Littéraire, 1843, p. 315.
- (26) 孫錦泉:〈歐洲掌握中國造瓷技術的曲折歷程〉,載《社會科學研究》,2002年第2期,頁125。
- (27) 李夢芝:〈明清時期中國瓷器對歐洲的影響〉,載《歷史教學》,1997年第4期,頁54。
- (28) (29)(法)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二卷,頁256;頁251。
- (30) (清)藍浦,鄭廷桂著,歐陽琛、周秋生校點,盧家明、左行培註釋,《景德鎮陶錄校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40。
- (31) 李晟文:〈清代法國耶穌會士在華傳教策略〉,載《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頁51。
- (32) 韓琦:〈康熙朝法國耶穌會士在華的科學活動〉,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2期,頁69。
- (33)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二卷,頁145。
- (34)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二卷,頁225。
- (35) (法)伏爾泰著,高達觀等譯:《哲學通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93。
- (36) 曹增友:《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頁376、頁377。
- (37) 屈維英:〈“康乾盛世”重視推廣“種痘”術〉,載《中國醫藥指南》,2007年第1期。
- (38) 曹增友:《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頁376。
- (39)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二卷,頁144。
- (40) (清)張琰:《種痘新書·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20冊,頁79。
- (41)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三卷,頁212。
- (42)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三卷,頁217。
- (43)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三卷,頁219。
- (44) (法)羅莎:〈入華耶穌會士與中草藥的西傳〉,載(法)安田朴、謝和耐著,耿昇譯:《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頁285。